

陶渊明诗文选译

本书责编：周田清
封面设计：陈世五
版面设计：盛寄萍

·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
(第一批50种)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新华印刷厂
成都印刷一厂印刷
巴蜀印刷厂
1990年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5,000 套

ISBN7-80523-357-8/Z·27

定价：(50种) 130.00元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编委会

顾 问

周 林 邓广铭 白寿彝

主 编

章培恒 安平秋 马樟根

编 委

(均按姓氏笔划多少排列)

马樟根 平慧善 安平秋 刘烈茂 许嘉璐
李国祥 金开诚 周勋初 宗福邦 段文桂
董治安 倪其心 黄永年 章培恒 曾枣庄

(以上为常务编委)

王达津 吕绍纲 刘仁清 刘乾先 李运益
杨金鼎 曹亦冰 常绍温 裴汝诚

(以上为编委)



序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丛书编委会的同志与众多专家学者通力协作、辛勤耕耘的结果。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漫长的岁月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给人类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今天，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整理研究我国古代文化典籍，做到汲取精华，剔除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使人们在正确认识民族历史的同时，得到爱国主义的教育，陶冶道德情操，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使文明古国的历史遗产得以发扬光大，这是我们每个炎黄子孙的责任。而要做到这样，对古籍进行整理与研究是重要的基础工

程。但是，整理与研究古籍仅作标点、校勘、注释、辑佚还不够，还要有今译，使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都愿意去读，都能读懂，以便从中得到教益。

基于以上认识，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于一九八六年五月组成了以章培恒、安平秋、马樟根三位同志为主编的《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编委会，确定了以全国十八所大学的古籍整理研究所为主力承担这一看似轻易、实则艰巨的今译任务。在第一次编委会议上，拟定了《凡例》、《编写与审稿要求》、《文稿书写格式》和一百余种书目。以每一种书为十万至十五万字计算，这套丛书大约有一千余万字，应该说是一项大工程。经过一年的努力，完成了第一批三十六部书稿的译注任务。在各研究所的专家与所长把关的基础上，于一九八七年五月和七月，先后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召开了部分编委参加的审稿会，通过了二十五部书稿，作为《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的第一批作品。与此同时，在一九八七年七月六日，邀请了在京的十几位专家教授与编委会十几位编委一起座谈这套丛书与古籍今译的问题。专家们肯定了今译工作的必要性与深远意义，并以他们数十年的教学科研和创作的经验，说明今译是一项

难度很大的工作，是培养人才，使之打下坚实基础的一种有效方法；专家们还对《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提出了宝贵的建议，这对当时的审稿工作和保证《丛书》的质量起了很好的作用。

实践证明，古籍的今注不易，今译更难。没有对作品的深入、透彻的研究，没有准确、通俗、生动的语言表达能力，要想做好今译是不可能的。两年多来，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在探索古籍的今注、今译的道路上，做了一些工作。这部丛书的出版，是系统今译的开始，说明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有了新的进展。更可喜的是，一批中青年学者参加了今注今译工作，为古籍整理增添了新生力量，相信他们会在实践中，在学习中，成长成熟。我希望，这套丛书的编委会和高校各古籍整理研究所要敞开大门，加强同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联系，征求他们和广大读者的意见，并向有真才实学而又适宜做今译工作的专家学者约稿，以提高古籍译注的水平，使《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的第二批、第三批作品的质量更上一层楼。

这是一套以文史为主的大型的古籍名著今译丛书。考虑到普及的需要，考虑到读者对象，就每一种名著而言，除个别是全译外，绝大多数是选译，即对从该名著中精选出来的部分予以译注，译文力

求准确、通畅，为广大读者打通文字关，以求能读懂报纸的人都能读懂它。我希望这套丛书能成为中小学教师的语文、历史教学的参考书，成为大专院校学生的课外读物，成为广大文史爱好者的良师益友。由于系统的古籍今译工作还刚刚起步，这套丛书定会有不少缺点、错误，也诚恳地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巴蜀书社要我为这套丛书写序，我欣然接受了。我相信这套丛书不仅会使八十年代的人们受益，还将使子孙后代受益，它将对祖国的繁荣昌盛起到点滴的作用。最后借此机会向曾给予我们支持、帮助的专家学者和巴蜀书社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并殷切地希望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和我们一同做好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的整理工作，为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再放异彩而努力！

周 林

一九八七年十月于北京



前 言

四、五世纪之间，中国文坛上出现了一位伟大的文学家陶渊明。

陶渊明，又名潜，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西南）人。生于晋哀帝兴宁三年（365），卒于宋文帝元嘉四年（427），享年63岁。他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而大部分时间是在东晋王朝中度过的。

自西晋于公元316年（建兴四年）灭亡，司马氏在江南建立东晋政权，我国又进入了南北长期分裂的时代。北方各族上层统治者在中原一带割据混战，并经常对南方发动骚扰进攻。南北之间，时有战争发生，历史上有名的秦晋淝水之战就是爆发在

公元383年。

东晋王朝是一个靠政治上推行门阀制度，在经济上对广大劳动人民实行残酷剥削来支撑的偏安政权，政府实权完全被世族大地主操纵。他们强化门阀政治，严格士庶之别，把“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作为对内的基本国策。然而在上层统治阶级世族之间、世族与皇族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十分剧烈，这种斗争在东晋政权存在的一百零四年中从未间断，酿成多次内乱，人民流离失所。

士族大地主利用经济上的特权，采取各种手段掠夺土地，建立田庄经济，而把沉重徭役和赋税都压在劳动人民身上，人民的生活极端困苦。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激化了与人民的矛盾，终于在公元399年爆发了孙恩领导的农民起义，这场起义一直持续了十二年。

陶渊明生活的年代，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空前尖锐，政治极为黑暗、腐朽。

陶渊明出生在一个衰落的官僚家庭，曾祖父陶侃是东晋的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祖父陶茂和父亲陶逸都做过太守一类的官。外祖父孟嘉是东晋名士。陶渊明的祖父、父亲并不是承袭陶侃爵位的嫡嗣；渊明七、八岁时，其父便已去世，因此，他从少年时代起，就生活在贫困之中。由于家庭环境的

影响，陶渊明很小就喜爱读书，对儒家的经典有特别浓厚的兴趣。他读书的范围，除了儒家的经典，再就是两晋时代盛行的《老子》、《庄子》，还有大量的先秦至汉魏的史学、文学著作，广泛地接触了古代文化遗产。

陶渊明年青时，颇具“大济苍生”（《感士不遇赋》）的宏伟抱负，希望有一番作为。从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至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在这十三年中，陶渊明曾先后担任过祭酒、参军、县令等官职。他性格正直耿介，与官场的腐朽风气格格不入，几次都是辞官而去。最后一次从彭泽令任上辞职，结束了他的仕途生活。从这时起，他精神上感到极大的解脱，真正走上了“躬耕”的道路。

归田之初，陶渊明和家人都参与了耕作，还有一个僮仆帮忙，温饱也不成问题，心情是愉快的。义熙四年（408）六月，他家被一场大火焚毁一空，一家人只好寄居船上。义熙六年（410），他把家迁往南村，理由是这里有一些好邻居。与他来往的人中，有农民，也有一些隐居浔阳的文人和参军、主簿、县令之类的小官。

陶渊明在南村继续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但家境大不如前，常常是终年辛劳，难以糊口。

在出仕和归隐的问题上陶渊明曾产生过一些思想斗争，由于他对现实腐败的政治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毅然坚持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态度，义熙末年，他又一次拒绝了朝廷聘他为著作郎的征召。

晋恭帝元熙三年（420）六月，刘裕夺取了东晋政权，建立刘宋王朝。对政治上这个重大变化，陶渊明在作品中往往流露出感慨和激愤之情。

陶渊明的晚年，生活愈来愈贫困，他的一些朋友有时也主动周济他，如颜延年经过浔阳，临别前给陶渊明留下两万钱。有时陶渊明也不免上门乞借。宋文帝元嘉三年（426），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到他家看望，陶渊明饿了好几天，这时连起床都很困难。檀说：“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陶回答：

“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见萧统《陶渊明传》）檀赠以粱肉，陶渊明挥而拒之，表现了他的铮铮骨气。陶渊明贫病交加，身体愈来愈衰老，宋元嘉四年十一月与世长辞。

亲友们用俭朴的仪式安葬了他，认为他具有“宽乐令终之美，好廉克己之操”（颜延之《陶征士诔序》），为他立谥号“靖节征士”。

二

现存陶渊明的作品，诗 124 首，其中四言诗 9 首，五言诗 115 首；文 11 篇，其中辞赋 3 篇，记传赞述疏祭 8 篇。另有与愔之、循之《联句》一首存疑。

陶渊明作品的主要内容反映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对黑暗腐败封建政治的揭露和批判

陶渊明早年抱有建功立业的愿望，但最终走的是不与当权者合作，洁身自好的道路，这种行为的本身，就是对当时政治的一种否定。他在作品中，也对当时的黑暗、腐败政治作了一定程度的揭露和批判。

晋、宋讲究血统，门阀等级森严，刑罚因贵贱而异施，嫁娶只能门当户对，“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晋书·刘毅传》），士庶之分壁垒森严，造成极为腐朽、庸俗的社会风气。官场“交通请托，贿赂公行”（《资治通鉴》卷一〇七），趋炎附势，尔虞我诈，比比皆是，触目惊心。为了向上爬，可以不择手段，“或假财色以交权豪；或因时运以佞荣位；或以婚姻而连贵戚；或弄毁誉以合

威柄”（葛洪《抱朴子·疾谬》）。陶渊明的思想与这些格格不入，在他的作品中对这腐朽的世风进行抨击，《感士不遇赋》最能代表他的这种批判精神。他揭露当时的社会虚伪之风盛行，道德败坏，持不同意见的遭到诽谤，善良正直的人遭受诬蔑，廉洁退让的节操丧失以尽，是非颠倒，奸贤莫辨。随着社会政治经验的丰富，陶渊明进而认识到，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封建专制制度，所谓“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他在这篇赋中，历举志士仁人的不公平待遇，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长期以来的封建专制制度。在有些诗篇中，他批评人们判断是非都是捕风捉影，或毁或誉都是人云亦云；他感慨人与人之间只有利害关系，相交困难；他把当时的官场视作“泥潭”，他把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势利之徒斥之为“狂驰子”。

陶渊明的另一部分作品是以歌颂美好事物的形式来曲折地表现对当时政治的否定。例如他所描绘的桃花源的理想社会，与他当时所处的社会形成鲜明的对比。他晚年的一些“金刚怒目”式的作品（如《咏荆轲》、《读山海经》等篇），则表现了他对当时腐败政治激烈的批判精神和强烈的反抗意识。

（二）对农村田园生活的描写

由于陶渊明是厌恶上层社会的虚伪和相互倾轧而归隐的，因此他笔下的农村田园风光往往是宁静、淳朴而美好的。我们从《时运》、《和郭主簿》、《移居》（一）、《读山海经》（一）等诗中可以看出，陶渊明远离尘嚣，无论是春游、登高、饮酒、读书，还是与家人欢聚、与朋友谈心，心情是愉快的。他认为人生的第一要事是吃饭穿衣，“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获得衣食主要靠劳动，《劝农》诗集中反映了他重视农业生产劳动的可贵思想。他不食“嗟来之食”，立志靠劳动来养活自己，其《自祭文》概括地叙述了他辛勤劳动的大半生。有些诗篇，如《归园田居》（三）、《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等，具体描写了他参加劳动的情景和艰辛。还有一些诗篇如《归园田居》（二）（五）、《饮酒》（九）等，反映了陶渊明通过参加农业劳动，同农民建立了感情，交往融洽，有了一些共同语言，耕耘稼穡，收获年成常常是他们谈话的主要内容。“躬耕”成了陶渊明主要的生活来源，他比任何时候都关心庄稼收成的好坏。陶渊明的“躬耕”并不能保障起码的温饱，所

以他的不少诗篇，如《杂诗》（八）、《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有会而作》等，又都如实地诉说了生活十分贫困的艰难处境和劳而无食的愤懑。当时军阀混战不已，江州又是屡次“鏖战”的战场，农业遭到极大的破坏，陶渊明很关切处于战乱中，又深受徭役和赋税剥削，生活极为痛苦的广大人民，他的《归园田居》（四）、《和刘柴桑》、《还旧居》等诗篇，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农村凋敝、凄凉的情景。陶渊明苦苦思考着广大人民的出路，终于，桃花源这个美好的社会雏型在他的笔下诞生了。它体现了陶渊明的理想，也凝聚着他对农村、对农民的深切了解。

（三）对人生哲理的探索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文学艺术的“自觉”时代，也是中国古代哲学争鸣的又一个黄金时代。那时的许多知识分子，常常用文学的形式来表现对人生哲理的深入探索，陶渊明也是如此。他在文学作品中的人生哲理的种种思考，反映了他对人生道路选择的历史轨迹。

人的价值在哪里，人的一生究竟怎样度过？这是陶渊明作品中经常思考的主题。从他中年或晚年回顾年轻时情景的诗篇看，他少壮时算是一位热

血青年，支配他生活的最根本的信念，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只不过仕也罢，隐也罢，都以保持个性自由和独立为前提，即所谓“或击壤以自欢，或大济于苍生，靡潜跃之非分，常傲物以称情”（《感士不遇赋》）。他的整个生活道路便是沿着这条轨迹而行，他认为人的价值也就在这里。如何求得“达”，陶渊明认为应该用光明磊落的行为和通过正常的途径，“原百行之攸贵，莫为善之可娱。奉上天之成命，师圣人之遗书，发忠孝于君亲，生信义于乡闾，推诚心而获显，不矫然而祈誉”（《感士不遇赋》）。当门阀政治的腐朽士风逼迫他“摧眉折腰”，个性受到压抑的时候，他便宁肯辞官也不低头。

陶渊明的作品中，还不乏对生与死的思考。光阴无情流逝，自己无所成就，渐就衰老，他常常感到悲愁；对比大自然宇宙的无穷和人生的短暂，他固然也有忧伤，但不象魏晋许多诗人那样凄楚悲观。他对死的态度，往往是相当旷达，认为宇宙的变化是个人的力量无法阻挡的，大自然自身运动的必然结果是事物的新陈代谢，“大钧无私力，万物自森著”（《形影神·神释》），作为一种有生命的自然物的人，必然会有死的时候，“既来孰不去，人理固有终”（《五月作和戴主簿》）。他比

喻人世间犹如旅舍，“家为逆旅舍，我如当去客”（《杂诗》（七）），人生在世，如同在旅舍歇息几日的过客，人的最后归宿，只不过将尸骨托之山陵，与山陵大地混为一体罢了。因此，他否定道教服食仙丹，追求肉体不灭的主张，对佛教宣扬的因果报应，精神可以脱离肉体长存的一套，也进行了旗帜鲜明的批判。他否定鬼神，甚至对所谓超越客观世界的、主宰人类善恶公道的上天意志表示怀疑，“天道幽且远，鬼神茫昧然”（《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更反对人们为了死后或来世幸福，向佛寺和“鬼神”捐舍钱财的风气和做法，“留子不留金，何用身后置”（《杂诗》（六））。

三

萧统评价陶渊明作品的艺术特色“词采精拔”“独品众类”（《陶渊明集序》），我们可以具体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率真”、“任情”的美学追求

“风格即人”这条艺术的规律，在陶渊明身上得到证明。从其作品看他对自己形象的塑造、率真、任情，不掩饰、不做作，不为世俗左右，我行